综　　述

抗日战争(1937—1945 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新桂系史》第 2 卷，完整地描述了新桂系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的动作轨迹，探究了新桂系领袖们的性格特点。

抗战时期的中国，存在着多种矛盾。其中，同新桂系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的有三个矛盾。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蒋桂之间的矛盾。三个矛盾互相联系，错综复杂。考察新桂系领袖们面对错综复杂形势所作出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些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有些复杂的现象，在本卷得到了深入的分析。

一、蒋桂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共倡议合作抗战的压力下，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实行抗日战争。1937 年 8 月 4 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自桂林飞抵南京。22 日，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0 月 12 日，军委会正式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0 月 13 日,李在南京会晤蒋介石,11 月 12 日转赴徐州就职。广西军

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使蒋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蒋介石既有联合桂系抗日的一面，又有不放过桂系这个宿敌的一面。他邀请李、白出任南京政府要职，无非出于以下缘由：

——强敌大举入侵，南京政府受到直接威胁。己方嫡系军队兵微将寡，急须调桂军出战以弥补嫡系兵力之不足。

——李、白在北伐时有能战之名。他们主张抗日多年，对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颇具影响力，置李、白于麾下，有助于调遣西南地方集团的军队。

——桂系拥兵割据，终属后患。桂系的地盘在广西，李、白离桂供职，己方的政治经济势力大可乘虚而入。李在徐州，白在南京，分隔李、白于两地，不啻分割桂系首脑，使之互相疏远而削减桂系整体合力的能量。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新桂系收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号，转为“拥蒋抗日”。但蒋桂较量多年，李、白深知蒋介石其人言而无信。云南龙云及川军将领联名电桂：“传闻中央抗日，是否出于诚意，尚未可知。兄等未可轻易入京，恐抗日不成，失去自由，望深思熟虑。”因此，李、白应邀赴宁之前自然有一番揣度：

——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必有求于己，设陷阱于南京，诱使他们自投罗网，重蹈当年李济深的覆辙的可能性不大。

——他们一向高呼抗日，若不北上，何以自处？

——桂军在广西境外作战，如“朝中无人”直接掌握，这支军队岂不任蒋摆布？

——他们久盼再度染指“中央”政权，蒋已让出一席之地，理应趁机向外发展。

于是李、白决意应召，并电劝滇、川地方实力派龙云及川军将领“先国难而后私仇”，共同抗日。然而，蒋桂之间毕竟积怨已深，

因此新桂系的对蒋策略,既有‘拥蒋抗日’的一面,又有‘防蒋吞并”的一面。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残酷,给李宗仁留下了沉重的回忆“: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变本加厉。’时刻提防蒋介石‘消灭非嫡系部队”,已经成为李宗仁等桂系领袖的凝固心态。

蒋桂双方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他们有合作抗日的一面，因为抗日符合他们各自的最大利益。但两个集团之间在权力、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又使他们陷入明争暗斗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只是这种争斗没有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而已。

二、李宗仁、白崇禧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形成了两个互相配合的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

尽管李、白有指挥作战的经验，抗日桂军也不失为一支劲旅，但这支军队背负着历史沉积的蒋桂矛盾重担，听命于蒋介石而走上抗日战场，他们将不得不付出额外的沉重代价。

1937 年 10 月桂军投入淞沪会战之前，李宗仁曾经向蒋介石建议,淞沪为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长期死守,上海作战适可而止，桂军廖磊部第 21 集团军应布防在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凭险据守。蒋介石认为上海战场仍要坚持，以便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持，严令廖磊所部开赴上海大场参战。桂军处于被动地位，旅长 6 人,3 死 3 伤,官兵伤亡惨重。大场失守,白崇禧建议以运动战代替阵地战,又被蒋拒绝。

11 月,日军第 6 师团由太湖南侧向吴兴进犯，企图切断淞沪

中国军队的退路。南京政府当局明知桂军第 7 军仅有 7 个团兵力，竟命令该军日夜兼程，奔赴吴兴阻敌前进。第 7 军以少击众，险象环生。当时，友邻部队川军 3 个师距桂军阵地仅 50 里，第 7 军军长周祖晃急电南京求援。南京当局置之不理，坐视桂军陷入困境。第 7 军连续苦战 9 日夜，“伤亡过半”，完成了阻击任务。但该军正副军长却落得个“作战不力”的议处，副军长徐启明上诉白崇禧。白无言以对，只能表示“谅解”，带着无可奈何的压抑。

淞沪、吴兴之役，桂军主力被置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浴血奋战。第 7 军与第 48 军“损伤残破之余，实是惊人”。蒋介石褊狭固执，决策错误，新桂系痛心疾首，有苦难言。李宗仁、白崇禧记取教训，在尔后的台儿庄、随枣、枣宜、昆仑关等战役里，力求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各自建树了不寻常的战绩。

李宗仁首先组织指挥了徐州会战，取得津浦铁路南段阻击战的胜利和台儿庄大捷。第五战区以徐州为中心，北至济南黄河沿岸，南至浦口长江北岸。淞沪会战期间，南京军委会就指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务必确保鲁南、苏北。1937 年 12 月 7 日，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部向桂军及所属各部队部署作战任务。其中，桂军李品仙第 11 集团军第 31 军负责守卫海州，廖磊第 21 集团军防守合肥地区。1938 年 2 月，李宗仁指挥的部队已达 13 个军 29 个师 21 个旅，共 28 万多人，主要是地方实力派的“杂牌军”。12 月 25 日，黄河北岸日军渡过黄河，第 3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青岛等地相继沦陷，1938 年 3 月，日军进逼临沂。在津浦铁路北段，国民党军频频失利。

在津浦路南段，日军攻占安徽滁县后，分路向北进攻，形成了沿津浦路南北会攻徐州之态势。李宗仁采取阻南歼北的方针，令桂军第 11 集团军担任长江北岸安徽地区的游击战，桂军第 31 军在临淮关和淮河两岸防御，阻敌北犯。1938 年 1 月 15 日，日军发动进攻，31 军英勇抵抗，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李宗仁令 31 军迅速西

撤“将津浦路正面让开”,连同于学忠所率东北军第 51 军在淮河北岸阻击日军,激战十余天,日军伤亡 9000 人。尔后,日军发起多次渡淮攻势,均被击退。日军沿津浦路南北会攻徐州的计划宣告破产。李宗仁“让开正面”,从侧后连续击敌的战役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而新四军敌后游击战的有力配合,则是津浦路南段阻击战取得胜利的基础和保证。

津浦路北段之敌,不顾南段日军受阻,悍然南下。3 月 16 日,濑谷支队进攻滕县,川军 122 师师长王铭章奋战殉国。蒋嫡系汤恩伯军团驰援不及,枣庄、韩庄、峄县失守。3 月 20 日,濑谷支队主力在峄县集结,企图向台儿庄、运河一线进犯。但其右翼坂本支队被庞炳勋和张自忠部拦截于临沂一线,濑谷支队被迫分兵支援。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留于峄县日军侧后,急调孙连仲部 31 师布防台儿庄,对进犯台儿庄之日军形成南北夹攻之势。日军第 10 师团长矶谷廉介令濑谷支队迅速攻占台儿庄。4 月 5 日,李宗仁严令汤恩伯军团出击敌侧后。次日,濑谷支队后撤,被汤军截击,损失惨重。台儿庄战役歼敌一万多人。

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采取积极防御的原则,运用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外线,将汤恩伯军团摆在敌军侧后;在内线,以一个师固守台儿庄正面,以两个师配置两侧,形成犄角之势。加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配合,终于击败了日军第 5、第 10 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1939 至 1940 年间,日军主力用于进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但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发动了一些规模不大的进攻战,如随枣(湖北随县、枣阳)战役、枣宜(湖北枣阳、宜昌)战役和桂南(广西南部)战役等。

鄂西北地区是逼临武汉,护卫川陕的战略要地,日军攻陷武汉后必将进窥第五战区的这一重要防区。1940 年 4 月下旬,随枣会战开始,李宗仁令桂军第 84 军作正面防御,诱敌进入袋形阵地。桂

军‘大小二十余战,我方正面始终未被突破”。但蒋嫡系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拒不执行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达的从侧后出击、封锁袋口、聚歼敌军的命令,以致敌军冲入随县。桂军第 84 军等部英勇抗击，日军师疲力竭而退。5 月上旬,枣宜会战继起,日军攻陷枣阳,李宗仁令桂军 173 师掩护主力撤退。第 173 师冒着猛烈炮火，节节抵抗“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殉国。”李宗仁电令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向敌后出击。敌军密集重兵，张部 74 师兵力单薄,伤亡殆尽,张自忠壮烈殉国。

当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

由于新四军在敌后的战略支援和牵制，李宗仁指挥的“杂牌军”成功地阻敌于鄂西北地区。日军发动几次进攻，仍不能越过五战区防地，扑向川陕。这是李宗仁的又一重要战绩。

桂南昆仑关战役,白崇禧称之为‘抗战以来攻坚之首次胜利”。南宁外围的重要据点昆仑关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9 年 11 月 15 日,日军从钦州龙门港登陆,11 月 24 日攻陷南宁,12 月 4 日进占昆仑关。白崇禧指挥桂军夏威第 16 集团军、蔡廷锴第 26 集团军等部，部署反攻，要求蒋介石指令驻在全州的蒋嫡系杜聿明第五军机械化部队担任主攻任务。在此之前的 4 月下旬,周恩来乘车从衡阳赴桂林，路经全州，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视察第五军军部。杜聿明设宴款待，参谋长黄琪翔作陪。周恩来向他们剖析了全国抗战形势，介绍了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并说：现在日军已不能像以往那样长驱直入，只能作跳跃式前进，蹦一蹦，停下来,喘口气,再蹦一蹦,再过一段时间,恐怕连蹦都蹦不动了。杜聿明等深以为然。12 月 17 日,杜聿明指挥第五军向昆仑关之敌发动攻击。战斗异常酷烈,昆仑关两得两失。至 30 日,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计击毙敌中村正雄少将以下官兵 4000 余人。桂南

会战期间，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战工团、广西学生军以及宾阳等县人民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部队的作战。

作为国民党地方派系集团的新桂系，他们的抗日军事运作，不能不受到派系利益的制约。他们以为自己有太多的理由，在坚持抗战和保存实力之间求得平衡，把蒋介石蓄意削弱桂军而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到了抗战后期，他们已经不再考虑这种“平衡”了，而是明显地向保存实力方面倾斜。这是因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大好形势，日本的失败为期不远，新桂系急于积聚力量，以便在战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的调整中保有较强的实力地位。

1944 年初夏，为了缓解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困境，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日军开始向京广铁路沿线的豫、湘等省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大都手足无措，一触即溃，丢失河南、湖南部分地区。秋天，日军进逼广西桂林。蒋介石令桂军夏威第 16 集团军确保桂林，指定第 31 军、第 46 军守城，趁机削弱该集团军的主力。白崇禧匆忙从重庆飞抵桂林，更改原定的兵力部署，将精锐部队调出桂林城，只留下战斗力较弱的 131 师、170 师守城。精锐抽走，守军无援。在激战中，131 师师长阚维雍、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自戕殉国，31 军参谋长吕旃蒙阵亡。1944 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战场的大溃败，彻底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新桂系从自身派系利益出发的保存实力政策，则直接导致了桂、柳的大溃败，从此，新桂系的声誉明显下降。

但是，新桂系的领袖们仍称得上是国民党将领中坚定的主战派。1937—1939 年，广西“先后征送壮丁近 50 万人，以人口为比例，广西征兵人数最多，居全国第一位”。李宗仁、白崇禧亲临前线，屡立战功。1939 年，日本曾多次诱降新桂系，李、白不为所动，严正表示“抗战到底”。黄旭初主持桂政，对抗日战争也表现了坚定的态度 。

三、蒋桂在广西、安徽的争斗

新桂系的老地盘在广西，安徽是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取得的又一个地盘。蒋桂在广西安徽两省政治、经济层面的控制与反控制争斗，连绵不绝。但双方都没有走向极端，没有激化成为公开的对抗，而是有所克制，采取折衷的办法缓解争端，维持合作抗日的局面。

新桂系盘据广西多年，统治网络盘根错节。蒋介石不可能设想在一个早上就全部控制广西，而只能从逐步蚕食广西的党政权力和财经权力入手，进行多方位的渗透，耐心等待全面控制广西时机的成熟。

在党政权力方面，蒋介石集团使用“派进来”和“拉出去”的手法，力图打破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党政团”大权独揽的局面。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郑绍玄等为广西省党部委员，三青团中央团部也在广西支团安插干将，瓜分新桂系的特权。但时隔不久，这些不受桂系欢迎的人，先后被挤走。为了堵住“派进来”的路子，每当广西绥靖公署和省政府系统的官员出缺，广西当局往往将开缺与继任官员名单，以同一文件发出，使蒋系无法见缺插手，安置自己口袋中的人物。国民党在重庆举办的“中央训练团”，曾千方百计在受训的桂系官员中收买和培养亲蒋对象，把他们“拉过去”。但是，标价出售者并不多，因为害怕被桂系察觉而丢掉乌纱帽。当然，也有少数没有暴露的人隐蔽了下来。

早在李宗仁、白崇禧离桂北上之前，他们已经充分估计到蒋介石觊觎广西的可能性。除了安排黄旭初留桂看守外，他们决定以开明姿态出现，利用在广西的国民党民主派同进步人士的广泛联系，加强同蒋抗衡的阵容。李宗仁向李任仁、陈劭先说，预期成立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是要以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

们的人”。1937 年 10 月 9 日，李宗仁亲自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典礼，并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在广西的国民党民主派李任仁、陈劭先主持日常会务。这个形式上为广西建设提供意见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新桂系争取“同情者”以对付蒋介石为主要目的的政治性组织。李、白、黄出任正副会长，足见他们对广西建设研究会的高度重视。李任仁、陈劭先通过这个合法机构，做了许多有利于民主进步事业的工作。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夏衍、胡愈之、范长江、柳亚子、何香凝、李四光等，经李、陈疏通，成为该会的研究员。1940 年，该会的进步人士与全国各地的民主宪政运动相呼应，成立“广西宪政促进会”，公开抨击蒋介石的特务政治和独裁统治。新桂系对待国民党民主派和进步人士的故作开明，是企图以此取得政治上的制高点，遏制蒋系势力囊括广西。然而，这一举措本身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既伤对方，又伤自己。由此萌发的民主运动的“舆论效应”，不仅使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受到严厉谴责，而且也必然触及新桂系军事统制的要害。从此以后，新桂系已无法继续维持 30 年代前期他们在广西的统制模式。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但又始料未及的事情。

在财权方面，蒋介石集团借口统筹金融财政、统一币制，侵吞桂系的纸币发行权和广西银行的硬通货。规定桂钞以一元换法币五角的比值回收，广西银行的现金准备金计大洋 470 多万元、毫银 440 多万元、黄金 8300 多两、白银 91000 多两也要全数上缴中央银行。

新桂系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38 年，广西省政府自行决定在香港印刷金额为 500 万元的辅币。国民党财政部获悉后，不准发行此项辅币，指令广西省政府将印就的新钞全部存放中央银行桂林分行保管。次年，广西省政府以市面缺乏辅币找补为理由，向财政部缴纳保证准备金后，把这 500 万元纸币投放市场流通。尔后，广西银行又以向中央、中国、交通、中农四行存入存款作为现金准备

的办法,印发辅币券 500 万元。1942 年,国民党重庆政府将早已印制的‘关金券”,以一关金折合法币 20 元的比率投入流通。上行下效,广西省政府也将 1936 年印就的‘广西省金库毫银券’折合法币 231 万元发行使用。蒋桂双方争相发行纸币,加剧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广西人民饱受其害。

国民党把全国财政划分为国家财政与省级财政两大板块,指定中央银行桂林分行为国库署广西分库,管理广西省的财政收支。广西的财政独立不复存在,新桂系能够采取的对策,就是超编、多编和追加预算,加大行政开支的口子。由于中央银行不可能在广西各地遍设分支机构,因此,部分属于国家财政的收入,仍由广西银行代理收进后转缴中央银行。广西银行利用‘一收一转’的时间差,故意拖延不交,长期占用代收资金,给中央银行制造困难。

抗战前,桂系设立‘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垄断全省农矿产品出口,年获利数百万元。抗战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实行战时贸易统制,取消各省出口贸易的独家垄断特权;‘广西出入口贸易处’被迫结束。广西省政府黄旭初另起炉灶,下令成立商办形式的“广西企业公司”,由省政府拨款 200 万元,向广西建设厅低价购进工厂、矿山、林场,使之不落入蒋系之手。蒋介石集团控制广西经济的企图,每走一步都受到新桂系的抵制。

新桂系控制安徽,开始于 1938 年 1 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之时。同年 10 月,武汉失陷,廖磊第 21 集团军退入大别山,安徽省政府主席由廖磊兼任。安徽襟江带淮,西靠大别山。当时全省各县,除极少数外,均有敌踪。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依赖新四军在安徽江北和大别山的抗日斗争以及共产党人的帮助,桂军才得以在大别山区立足。1939 年 10 月,廖磊病逝,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之后,则为夏威。从 1938 至 1949 年,桂系控制安徽达 12 年之久。

抗战时期，蒋桂在安徽省的争斗，大致与广西相似。但新桂系盘据皖省为时尚短，羽毛未丰，不得不作出更多的让步。例如，CC系的刘真如、卓衡之曾先后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方治任省教育厅长。后来，蒋介石在大别山区设第 10 战区，打算以嫡系将领刘峙任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再次让步，愿意出任有名无实的汉中行营主任，而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位让给刘峙。于是，蒋介石让李品仙留任安徽省主席，新桂系总算保住了皖省地盘。

1945 年 5 月，国民党召开第 6 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委”和‘总裁’。这是一个坚持专制独裁、反共反人民的大会。当大会讨论中共问题时，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屈武、王昆仑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主张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王昆仑发言质询：会议不讨论打败日本，到底有没有抗战的决心？方先觉投敌，为什么又以‘民族英雄’出现于重庆？蒋介石大骂王昆仑：“你竟然在大会上替中共说话，你简直是中共的代表。”蒋的谩骂激起不少人的反感，有人在背后批评蒋：“中正不正，总裁独裁。”尽管李宗仁、白崇禧的反共立场与蒋并无二致，但对蒋的专横跋扈也深为不满。白崇禧表示，他本人及与桂系有关的 30 个代表将为王昆仑作后盾，支持王当选“中委”。王昆仑当面指斥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后来被迫流亡海外。新桂系在国民党内并非资深派系，他们在国民党“六大”的这一动作，实出于‘借局布势’，提高自己的声望，并顺带给蒋一记闷棍。

四、新桂系与中共

抗日战争前，中共为争取新桂系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

不少工作。抗战开始后，中共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继续同新桂系等地方实力派进行广泛接触，共商国事。毛泽东指出：“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立场。”周恩来也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专制独裁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

在抗战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同白崇禧常常见面。1938 年 2 月，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路经武汉，白崇禧邀请周恩来向学生军作讲演。在赶赴徐州协助李宗仁之前，白崇禧向周恩来、叶剑英请教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兵员分布和地理形势之后指出：在徐州以北的津浦路北段，宜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徐州以南的津浦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 4 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造成南段日军时刻受到威胁的态势，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深为赞赏。

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要张爱萍去徐州，直接做李宗仁的工作，劝他在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对李宗仁说：日军占领济南后，孤军深入，骄兵必败。徐州以北的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个沉重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民众中，特别在国民党中的威信。李宗仁听了之后，高兴地表示，这个意见很好。

1938 年 7 月，李宗仁在武昌治疗牙疾，周恩来与李会晤，谈加强团结抗战问题。并商得李的同意，在第五战区成立“抗敌工作委

员会”,由中共派李范一当政治部主任、李相符为副主任,在河南信阳一带开展活动。5、6 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精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白崇禧自认为已领会《论持久战》的主要精神，将其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军委会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

10 月,白崇禧赴长沙,车到十里铺附近,机件故障,下车等候司机修理。适逢周恩来乘车随后赶到，邀白同车前往。沿途倾谈，周恩来向白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提出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发动敌后游击战问题，白崇禧表示赞同。 11 月中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和协助。同月下旬，白倡议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集中各省部分军官学习游击战术，由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担任教育长。12 月初,周恩来到达桂林,会见白崇禧。1939 年 5 月，叶剑英应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邀请，由白崇禧陪同，向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师生作讲演，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叶剑英全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指出：只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就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黄绍竑和周恩来也有较多交往。 1937 年 9 月,八路军 115 师按照周恩来的筹划，在山西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 1000 多人,取得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10 月,举行忻口会战,第 14 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领数万兵力，在娘子关设置防御阵地，阻敌西进。周恩来参与了忻口会战的作战研究。他和彭德怀会见了卫立煌后，又到娘子关会见黄绍竑，对黄在东线的作战提出了许多建议。忻口会战，是华北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取得较好战果的一个战役。11 月初旬，太原失守后，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准

备退过黄河以西，战事推给黄绍竑、卫立煌主持。周恩来赶到临汾,同黄、卫会晤,力主坚持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9 年春，周恩来在重庆遇见已经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他对黄说：“现在到处都发生磨擦，只有季宽先生（即黄绍竑)那里没有发生摩擦”;“打算到浙江看看”。黄绍竑当即表示欢迎。周恩来到桂林后，同黄从桂林出发，乘车经长沙东行。3 月,周恩来应黄绍竑邀请到达浙江金华，浙江的军政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除了同黄绍竑会商有关抗战问题外，还达成口头协议，由中共方面派代表同黄联系，以便遇事及时商量解决。周恩来在金华时，曾对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说：浙江地位重要，在浙江的国民党内部军政之间的矛盾较多，黄绍竑较进步，要积极争取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对黄绍竑的联共抗日态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新桂系同蒋介石的损人利己政策有矛盾，他们同中共联系的政治目的在于加强同蒋介石抗衡的地位。但是，新桂系的领导核心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同工农阶级也有矛盾。因此，一面和蒋介石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新桂系的领袖们表现出复杂的性格特征。前一种对立的存在，造成了蒋桂争斗永无宁日，不仅加深了桂、皖两省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而且导致了新桂系在对日作战上的两面性，既有积极抗日的一面，又有为保存实力而退避的一面。由于后一种对立的存在，新桂系不可能放弃对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和人民大众的压迫政策,也不可能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拒不“奉命行事”。

1939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桂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遣桂军向在安徽、湖北抗日的新四军发动进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强硬地抗议他们破坏抗日的行为，并且在军事上进行坚决的自卫斗争。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刚被打退不久，1940 年 7 月，李品仙又背信弃义，下令桂军第 84 军 138 师进犯新四军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一再忍让而后奋起自卫，击败桂军 138 师，乘胜攻克定远县城后及时收兵，提议和谈休战。新四军正确处理抗日与统一战线的关系，严守自卫立场，挫败了桂军的进攻，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1940 年 10 月 19 日)开始，而以 1941 年 1 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这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在第一次反共高潮里，李宗仁虽然奉命行事，派军进攻新四军，但从总体上看，桂系仍“居于中间的立场”。当第二次反共高潮出现时，“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① 因此，中共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名单有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没有点到李宗仁、白崇禧。然而，桂系广西当局对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镇压和迫害，远远超出了这两次反共高潮的时间跨度，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新桂系领袖们转到反共方面的倾向，迹象分明，无可掩饰。

五、危险的政治走势

抗日战争时期，蒋桂双方既合作抗日，又互相争斗。在蒋桂争斗中，新桂系不是失败者，而是有限度的得利者。他们在蒋介石居心叵测的指挥下，在淞沪战场丧失了一部分兵力，但从广西又补充了更多军队；他们丧失了广西的一部分财权，但增加了对安徽省的控制权。李、白在国民党“中央”身居高位而没有实权，但他们的抗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83 页。

日战绩和职务联系却扩大了他们在国民党“杂牌”军中的影响，提高了他们在地方实力派中的声望。同战前相比，新桂系的综合势力不是被蒋介石削弱了，而是增大了。

但是，新桂系势力的膨胀，只局限于军队数量的增加和地盘的扩大。这是旧的量的变化，而不是新的质的变化，即主要没有军队的进步和政治的进步。“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①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军阀意识，使新桂系的领袖们不可能产生进步的心态取向，去接受民主政治，摈弃军阀主义的军事政治制度。他们的开明姿态，绝不意味着尊重人民，让人民获得民主权利，也不意味着他们同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认同。

抗战八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族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中共坚持敌后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大增加；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了很大增强，并同中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结束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但是，无论蒋系或新桂系都对中国的巨大变化和人心之所向作出了否定性的理解，他们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尤其害怕人民力量的发展，危及自己少数人的派系利益。新桂系实际上赞成了蒋介石的分裂倒退的方针，投蒋所好，为蒋介石在战后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出谋献策。抗战胜利前一年，李宗仁向蒋介石建议，日本一旦宣布投降，就命令各地日、伪军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国民党军尽快向长江以北推进，并在黄河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47 页。

流域早作军事部署。白崇禧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抗战结束之时，“应乘战胜余威,先将中共剿平。”他根据德国鲁登道夫《总体战》一书,制定“总体战”方案,“发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力量，期能借此弭平中共。”蒋桂合流反共的趋向，加剧了蒋介石的反动，加深了内战危机。新桂系迎合蒋介石的意旨，把反共反人民放在第一位，企图抛弃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样，他们就会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新桂系在抗战胜利前夕选择的政治走势，是他们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思维定式所规定了的。然而，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主观设想的反面走去，他们已经走在危险的道路上。

新桂系坚持抗战，在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李宗仁、白崇禧是有贡献的人物，他们在抗战八年的历史空间里占有一定的位置。但也应该看到，他们的阶级属性、派系私利和保存实力盘据一方的军阀主义意识对抗战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的贡献背后，有一个复杂的心路历程。

至于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广西军队爱国官兵，都是为争取民族解放而牺牲。他们的业绩，已成为历史的永久。